



党风廉政学习材料

(2014年第2期 总第12期)



南港开发公司综合管理部编印
2014年6月

目 录

中央精神……	中国调整反腐策略 打击行贿成为重点	(2)
廉政漫画……	雅贿	(5)
热点关注……	图解：中纪委“最一月”“老虎”纷纷落马	(5)
廉政先锋……	19年坚守反腐一线	(7)
	——记基层纪委干部陈宇旭	
廉政史话……	林则徐厅堂佳联	(10)
警示案例……	70后正厅级官员传媒“少帅”的滑铁卢	(11)

【中央精神】

中国调整反腐策略 打击行贿成为重点



今年4月下旬以来，最高人民检察院连续两次召开会议，强调扭转此前长期存在的“重受贿轻行贿”局面，将行贿犯罪查办纳入办案重点。为给打击行贿提供更好的法律支持、将打击行贿纳入反腐重心，目前，司法部门也正在研究修改或出台相关法律政策。

行贿不影响人大代表资格

许兰亭最近一次为贪官辩护是去年底吉林原副省长田学仁案。

这起受贿案中，10名行贿人没有一人因行贿被定罪。其中据检方指控，吉林省长春皓月清真肉业集团董事长丛连彪曾于2005年11月—2006年12月两次向田学仁行贿20万元人民币、2万美元，2万美元是在迪拜飞埃及的飞机上，而目前在吉林省人大官方网站上，丛连彪仍是省人大代表。

为高官辩护中，许兰亭发现：一起案件中往往是十几人甚至几十人同时向一名高官送钱，作为受贿方的省部级官员大多被判得很重，但数量更多的行贿者中，仅个别人员被法律追究，刑期也较轻。

河南省信阳市人民检察院反贪污贿赂局副局长刘继明曾对媒体表示：当前查处受贿者与行贿者没达到应有比例，让行贿者有恃无恐。

江西一名检察官统计 2008 年 1 月—2012 年 7 月江西东部某地级市全市、南昌市某区、宜春市某县、赣州市某县检察机关查办贪污贿赂犯罪案件发现，4 地 5 年共立查贪污贿赂犯罪案件 683 起，其中行贿犯案仅 41 起，占总立案数 6%；相比之下，受贿案占比最高。该检察官认为，“检察机关查办了大量受贿案，但查办的行贿犯罪案件数却寥寥无几。”

统计还分析了 41 起行贿犯罪案的判决情况。经撤销案件、不诉等层层程序过滤，最终诉至法院的有 20 人，6 人被判处缓刑，3 人免于刑事处罚，仅 3 人判处实刑，判处实刑数占行贿犯罪立案数 7.3%，“由此可见，对行贿犯罪判处刑罚相当宽缓。”该检察官指出。

今年 4 月，最高检首次公布全国检察系统查办行贿案件的详细情况。2013 年，全国检察机关共查办行贿犯罪 5676 人，占贿赂犯罪案件总人数的 31.4%。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天津市一位检察官撰文指出，1983—1992 年 10 年内，日本检察机关起诉受贿案 2900 件、行贿案 3789 件。

查办行贿的现实争议和矛盾

“一般来说，一个贪官受贿不止一笔、也不仅来自于一个人，常理推算行贿人应该比受贿人多。”中国人民大学法学教授何家弘向南都介绍，行贿犯罪案件查办率偏低，与查办面临的现实争议和矛盾相关。

从立法来看，刑法规定行贿罪是“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的行为。实践中，“不正当利益”和“财物”的规定，影响到罪名裁判。

对此，一位检察官以“办户口”为例向南都解释：为请工作人员更快办手续而送红包，并非“不正当利益”，不属于行贿；如果送的不是实体存在的金钱物品，而是出国旅游、解决亲友工作、提供女色等非财产性利益，也能逃脱“行贿”惩处。“近年的贪腐案件中，更多行贿人立足于长远投资，对手握实权的领导干部行贿时并不马上提出利益回报，定性为‘行贿’也存在争议。”

许兰亭也指出，受贿和行贿往往一对一发生，查办行受贿案件难以找到其他物证，更依赖于言辞证据。此前，官员贪腐案件查办中也是依靠行贿人揭发举证，行贿人则会

被当做“污点证人”给予“宽大处理”。

“人们普遍恨国家公职人员贪腐，反而同情行贿人，认为行贿也是被逼无奈。”何家弘说，以往将反腐重点集中在打击受贿也正是基于这一认识，但近年案件分析显示，有些行贿人为实现目的千方百计设计行贿手段，甚至为官员量身打造礼品，已经成为官员腐败的发起者，“遏制腐败状况，必须调整反腐策略，从源头上严厉打击行贿。”

扭转“重受贿轻行贿”局面

4月下旬以来，最高检连续两次召开会议，释放“加大惩治行贿犯罪力度”信号。

在4月24日召开的全国检察机关反贪部门重点查办行贿犯罪电视电话会议上，最高检首次披露贿赂犯罪案件查办的详细情况，明确提出要坚持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纠正只重视查处受贿、轻视打击行贿的观念，把重点查办行贿犯罪、加大惩治行贿犯罪力度作为当前一项重要工作来部署推动。

这次会议圈定下阶段打击行贿犯罪的重点为行贿次数多、行贿人数多的案件，行贿数额大、获取巨额不正当利益，行贿手段恶劣、造成严重后果等案件。会议还要求检察机关统筹查办行贿与受贿犯罪，既要防止只查受贿、不查行贿，也要防止查了行贿、查不实受贿等问题发生。

5月14日，最高检反贪污贿赂总局局长徐进辉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告：行贿犯罪案件是反贪总局今年的办案重点之一。他对媒体坦言，长期以来“重受贿轻行贿”的做法无形中助长了行贿犯罪的滋生蔓延。“不过这一局面正在转变：今年一季度，广州市检察机关共查办行贿犯罪人员89人，同比上升102.27%，立案查办的行贿和单位行贿犯罪案件首次超过了受贿案件总数。”徐进辉说。

南都记者了解到，继最高检之后，河南、陕西等地检察机关也迅速行动，启动“重点查办行贿犯罪专项活动”。陕西省检察院反贪局长贺佑荣直言：重点查办行贿犯罪是检察机关贯彻落实中央领导同志重要批示采取的措施，是反贪部门当前一项重要工作。

相关法律保障有望近期出台

“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要求对腐败犯罪的惩处不能有例外、要全覆盖。”反腐败研究学者、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廉洁研究和教育中心主任任建明认为，打击行贿纳入反腐重心，遵循了反腐规律，也符合“对腐败零容忍”的要求。任建明同时指出，自2010年查办行贿人数被写入最高检工作报告以来，加大行贿腐败犯罪查办力度已经提了有几年，

但从立法和执行层面尚存一定偏差。

天津市纪委副书记闫堃对惩治行贿调研后撰文指出，加大查办行贿案件力度，需要完善法律法规。闫堃建议，适当调整行贿罪“谋取不正当利益”的构成要件，在纪检监察和司法机关中形成统一标准；对行贿犯罪的立案标准进行相应调整，与受贿犯罪立案标准相统一，避免变相行贿行为逃脱惩处。同时还要关注非财物性贿赂问题，应采取有效措施，打击提拔职务、性贿赂等行贿人惯用的非财物性贿赂行为。

多次与贪官、行贿者打交道的许兰亭则认为，打击行贿的关键在于将法律法规落到实处，不要“网开一面”。“经济方面也不能让行贿人的好处，要明确没收、追缴非法所得的实际操作标准，以加大惩罚力度。”

据了解，目前，司法部门也正在研究出台相关的司法解释、条款，为查处行贿犯罪更好地提供法律保障。（来源：南都网）

【廉政漫画】

雅 贿



（来源：经济日报）

【热点关注】

图解：中纪委“最一月”“老虎”纷纷落马

解读中央纪委“最一月”

从2012年12月6日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案件查处”栏目通报首条案例至2014年4月11日，492天内有285名官员被调查通报，平均每周4名。

最引人注目的时段是6月中旬：

6月14日

政协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苏荣接受调查，创下今年以来落马官员职务最高纪录。



苏荣

6月19日

中央纪委“一分钟连打二虎”，山西省委常委、副省长杜善学，山西省政协副主席令政策，两名副省部级官员相继接受组织调查。



杜善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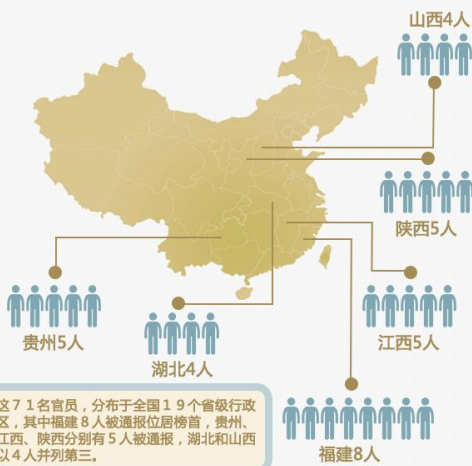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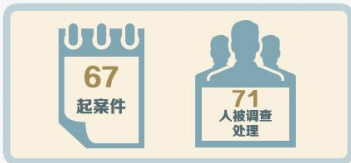
令政策



“打虎”速度不断加快，被查毫无征兆

2014年5月20日

2014年6月20日



这71名官员，分布于全国19个省级行政区，其中福建8人被通报位居榜首，贵州、江西、陕西分别有5人被通报，湖北和山西以4人并列第三。



中央直属企业 有7人被通报 分布于7个不同的单位

创下过去一个月内单起案例被查人数纪录。

总结：

“不论什么人，不论其职务多高，只要触犯了党纪国法，都要一查到底，决不姑息”不是一句空话。

【廉政先锋】

19年坚守反腐一线

——记基层纪委干部陈宇旭



“我只是做了自己该做的事。”坐在一间约 10 平方米的办公室里，长沙市望城区纪委监委常委陈宇旭盯着电脑上的各类信息，一脸坦诚地说。

他的身后，是一张黑色沙发和一床被褥——因为办案需要，有时这里就是他临时的家。在陈宇旭的时间坐标里，一年有 200 多天在外办案，他已记不清，多少个夜晚，他就是在这样简单的环境中度过。

从事反贪惩腐工作 19 年的陈宇旭，深爱着这份职业，他坦言，“我愿意在纪委干一辈子”。

“打铁还需自身硬”

1968 年出生的陈宇旭，最初在长沙市望城县(现改为区)一所农村中学担任地理老师，1995 年，通过公务员招考，陈宇旭离开讲台，来到望城检察院从事反贪工作。2012 年，陈宇旭调入望城区纪委。从最初的侦查员到反贪局副局长、反渎局局长，再到如今纪委分管案件查办工作的常委，他已在反腐一线工作了 19 年。

据了解，陈宇旭在检察院期间参与了大量大案要案的查办，并带领团队连续 10 年保持全省先进。在望城区纪委主管案件查办工作两年来，共立案 199 件，其中大要案 11 件，移送司法机关 11 人。

谈及自己的办案经验，陈宇旭认为关键在于“打铁还需自身硬”，“没有什么特别的

技巧，把心思用对地方，多在案件开展上下功夫，少些不必要的人情交往。”

2013年，正值湖南省实施“史上最严限宴令”的第一个年头，区里一单位负责人因违规操办酒席被群众举报，区纪委迅速介入调查。“被调查对象平时人缘不错，打招呼说情的人还真不少。”因为有人说情，调查遇到了一些阻力，办案人员纷纷觉得案子不好办。

作为望城区纪委分管案件的常委，尽管该案当事人与陈宇旭也认识，但陈宇旭还是果断地作出了一个决定：“这个案子我来接！”最终，这名负责人因违规办酒受到党纪处分。

某次办案，一位请托人将礼物送到了陈宇旭的车上，陈宇旭发现后，立即拨通了这位请托人的电话，要求将礼物马上拿走。

对于发生在民生领域，特别是关系到优化区域经济发展环境的违纪案件，陈宇旭态度坚决。2012年5月，区某单位一中层干部在对群众建房进行测量放线过程中，向对方索要300元到500元不等的误餐费，陈宇旭闻讯后，立即带队进行查处。最后该干部被调离岗位，并受到留党察看一年的处分。

“此案单笔数量不大，可牵涉人数多，在群众中造成了恶劣影响。对腐败分子绝不能手下留情。”陈宇旭说。“办起案来，他这个人‘油盐不进’。”陈宇旭的同事告诉记者。

“我母亲这边的亲戚全部是农民，父亲的亲戚多在外地。”陈宇旭说，办案过程中，亲戚找他帮忙的不多，即便找来，他也会耐心地解释并回绝。但不时还是有人通过朋友向陈宇旭求情。让陈宇旭印象尤深的是，他在办理一件科级干部受贿案期间，就接到了一位平时很要好的朋友的电话，请他出来吃饭关照一下，他在电话里当即表示，“请你理解我，我不方便。”之后，又有领导在电话里表达“请他照顾”的意思，陈宇旭给予了同样的回答。没想到，过了几天，陈宇旭突然接到了在农村教书时的一位老同事电话，称请他吃饭。陈在电话里，直截了当地问有什么事，前同事称好久不见，简单的见面聚会。等陈宇旭赴约后，发现饭桌上的人，大多都不认识，后通过介绍，他顿时明白是来说情的。饭桌上的气氛可想而知。陈宇旭说，他一言不发，饭后将这位前同事狠狠地“教训”了一顿。自此以后，“感觉没给他面子”的前同事与陈宇旭再无往来。

在陈宇旭眼里，这些饭局、酒会、娱乐等，很容易让人迷失自我。因此，他几乎刻意地将自己封闭起来，在他简单的交际圈中，除了家人、同事就是同学。闲暇时间，他总是待在家里陪陪家人、读读书、散散步。一些不认识或有目的性的邀约，他一律毫不

犹豫地拒绝。

“挺好，我喜欢简单的生活圈。”陈宇旭说，人非草木，孰能无情，作为“执纪者”，简单一些是对自己的保护，不会有太多纠葛。

“既然选择，就无怨无悔”

“办案悠着点，你在纪委又搞不得一世。”陈宇旭说，这是一天晚上加班分析案情时收到的手机短信，可自己一直没当回事儿，“既然选择，就无怨无悔。”

陈宇旭说，在他的职业生涯中，一些上级领导对他的教导，让他受益匪浅，也成了他 19 年来的工作准则。

陈宇旭回忆，在他办理的一件案子中，涉案对象反侦查能力极强，使得查办进度缓慢。当时一位分管该案的领导每隔两天便过来督查一次，并不时鼓励他们：“不要急，案子有进步。”不久后，这位涉案人员心理防线崩溃，交待了 50 多万元的涉案金额，此时这位主管领导问陈宇旭等办案人员意见，他们认为案子差不多了，可就此收手。不料，这位领导当面斥责他们说：“对犯罪分子的放纵，就是对职业的背叛，对人民的背叛。”

“我当时心里很不舒服，案件没突破的时候，领导不断鼓励，获得了突破，领导反而批评。”陈宇旭说，后来发现，领导的意见是对的，一个星期后，这位涉案人员又交待了 50 多万元涉案资金。

陈宇旭表示，此事对他影响很大，在办案过程中，他时时提醒自己要尽职尽责。

此外，在办案过程中，领导时常嘱托他们，外出办案，一定要把钱带足，绝对不能接受任何人的请吃及财物。

陈宇旭至今仍清晰记得，一年临近春节，他与同事被抽调到外地办案，一些不认识的人趁着他们乘坐电梯时，将高档香烟丢进了电梯并迅速离开。由于一时找不到送礼的当事人，回到单位后，陈宇旭第一时间将香烟交由组织上处置。

“我认为这是纪委办案最忌讳的，这也是我的个人底线。”陈宇旭说，时间一长，这便成了他的习惯和原则。同时，他也希望自己的言行举止，能给一同办案的年轻纪检干部作出表率。

熊锡军是陈宇旭的同事。熊说，工作中的陈宇旭确实给过他很大触动。2013 年底，熊锡军与同事办理了该区某单位一位干部中餐饮酒的案件。直到案子结束，他才得知，这位当事人是上司陈宇旭的同学。

“他从未向下属提出要求或暗示，要关照谁。”熊锡军说。

在处理与自身有关的问题时，陈宇旭尽量做到“避嫌”。熊锡军告诉记者，陈宇旭肠胃不好，早餐喜欢喝稀饭。偶尔时间紧，陈来不及购买，他就会将自己的私家车钥匙给单位司机，反复叮嘱他不准动用公车。

陈宇旭的母亲患有老年病，如果长时间见不到儿子，就会不高兴。某次，母亲想去走亲戚，让陈宇旭回去接一下。而他正在办案走不开，结果老母亲在自家门外等了一下午都不肯进屋。她埋怨说：“你小时候要到哪里去，我就带你去。现在我老了，要你带我走走亲戚，你却不管我了。”没有办法，陈宇旭只好请朋友开自己的车，把母亲送到了舅家。

望城区纪委副书记、监察局长黄祥明说，陈宇旭的可贵之处不仅是业务上非常熟稔，更重要的是他对纪检监察事业的忠诚。

“家人对我的工作都表示理解，让我很感动。”陈宇旭告诉记者，从妻子怀孕开始，他就因为工作忙没有时间陪妻子作检查，女儿出生后，他又第一时间赶赴办案点。妻子一直默默地担负着赡养老人，抚养教育小孩的重任。

“如今，我能做的就是在不忙的时候，尽量多陪陪家人，过简单而平静的生活。”陈宇旭说。（来源：中国新闻网）

【廉政史话】



林则徐厅堂佳联

近代著名政治家、思想家林则徐一生为官清廉正直、勤勉能干，因力主严禁鸦片、学习西方“以夷制夷”，史学界称他为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林则徐对经史和文学都有很好的修养，并擅长书法，平生书

写了不少用以自勉、表达情操的佳联。他撰写的厅堂联，联语或引用或自撰，语不求丽、意则深长，文情并茂、掷地有声，读之令人肃然起敬。

林则徐在出任江苏廉访使时，曾亲自用正楷书写了明朝思想家王阳明“愿闻己过，求通民情”的自勉联，悬于官署大堂之上，用以自警自励。此联只有八个字，却字字值千金。上联鼓励人们敢于向自己提意见；下联号召人们大胆揭发贪官污吏。作为封建时代的官吏，最大的需求是了解民情民意，最强烈的愿望是能听到别人指出自己的缺点和过错，这是多么难能可贵，又是何等的高风亮节。

道光十八年（1838年），林则徐受命担任钦差大臣，赴广东查禁鸦片。面对当时禁烟的内外阻力，他曾亲自为府衙题写了一副堂联：“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表明自己敢作敢为、不查绝鸦片誓不回头的勇气和胆识。上联言待人接物的态度，告诫自己要像大海一样，胸怀宽阔，广泛听取各种不同的意见；下联言立身行事的原则，砥砺自己要像千仞壁立，能够承受住千钧重压，决不屈服于敌对势力，做刚正不阿、没有私心、挺立世间的“硬骨头”。一身浩然正气和超人胆略凸显于字里行间。

鸦片战争前夕，为对付英帝国主义的挑衅，林则徐在广州城外新建了一座演武厅，精选士卒数百人勤加操练，积极备战。他多次亲往督操，并题写了“小队出郊峒，愿七萃功成，甲洗银河长不用；偏师成壁垒，看百蛮气慑，烟消珠海有余清”的对联悬于演武厅厅柱上。三军将士威震敌寇的雄姿在联中呼之欲出，林则徐顶天立地的民族正气也沛然充塞联中。此联还含有“乃知兵者为凶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的军事思想。林则徐厉兵秣马，实乃为保卫祖国主权不得已而为之，他多么希望这些部队能慑服百蛮，取得成功，从此过上烟消海清、洗甲不用的太平日子啊！（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

【警示案例】

70后正厅级官员传媒“少帅”的滑铁卢

位于武汉东湖之滨25层高的楚天传媒大厦，是报业蓬勃发展10多年的一个时代印记。

现年 44 岁的张勤耘，曾是湖北传媒界的领军人物。他参与创办的《楚天都市报》在业内取得过良好声誉和惊人效益。站在他位于 23 层的办公室，东湖在眼皮底下，一览无余。



4 月 1 日，湖北省纪委监委官网通报，湖北日报传媒集团党委委员、总经理张勤耘因涉嫌严重违纪，正接受组织调查。

张勤耘成为传媒界陨落的又一颗“新星”。在他手上，《楚天都市报》崛起于中部，他亦由此晋升为“70 后”正厅级官员。而他此次被查，有可能涉及媒体多元化经营的腐败问题。

部下牵连？

5 月 5 日，湖北省纪委网站发布消息，经中共湖北省委组织部证实，张勤耘因涉嫌严重违纪，省委已决定免去其湖北日报传媒集团（湖北日报社）总经理、党委委员职务。

张勤耘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是在 3 月 22 日，当天，他代表湖北日报传媒集团与神农架林区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在新闻宣传、旅游推介、项目合作等领域展开全面合作。

连日来，多名湖北日报传媒集团的工作人员对此事反应紧张，多数人拒绝置评。

一位湖北日报传媒集团的中层干部透露，目前集团有 3 名处级干部停职配合调查。集团内部人事变动，诸多工作无法推进，“大家都人心惶惶的，集团计划组织中层以上干部出去学习，可能就是为了稳定人心”。

出生于湖北广水的张勤耘是地道的农村孩子，父亲张国金是名教师，母亲没有工作，开过一家小店。张勤耘在家中排行老三，还有哥哥和姐姐。

与张勤耘相识 20 年的朋友刘正（化名）称，3 月 31 日下午，张勤耘被湖北省纪委带走。被带走后，他在医院工作的妻子也被纪委约谈多次，“一谈就是一整天。一次打电话

给她，只听见她的哭声，一句话没有说。”儿子面临中考，目前由姑姑照顾。

据多名湖北日报传媒集团内部人士证实，最初被带走的是楚天都市报副总经理周静。张勤耘落马可能与其有关。

公开资料显示，今年 38 岁的周静毕业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律系，1998 年进入楚天都市报。历任湖北日报传媒集团上海办事处主任、湖北日报传媒集团广告总公司副总经理、楚天传媒文化公司总经理等职。

从 2010 年 2 月开始，周静担任楚天都市报副总经理，兼经营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全面负责楚天都市报广告业务工作。

周静与张勤耘有多处交集。从 1997 年 1 月开始，张勤耘就担任楚天都市报广告部主任。2004 年 8 月，张又担任湖北日报报业集团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兼楚天广告总公司总经理。多年来，周静也一直是张勤耘的部下。

刘正称，张勤耘把周静招进报社，对周有知遇之恩。周静被调查可能是因为其亲属成立广告公司私下走账。张勤耘作为领导亦受牵连，但是否参与其中尚不得而知。

对于张勤耘案发事由，湖北媒体圈内也是众说纷纭。最常见的说法是与经营有关。这是他多年分管的领域，也被认为是最容易“出事”的领域。

“带着成绩说话的人”

楚天都市报创始人、第一任总编辑杨卫平，对张勤耘来说是绕不开的人物。

1990 年，年仅 20 岁的张勤耘从湖北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专科）毕业后，因为在大学期间的影评作品在全国获奖，他进入湖北日报社旗下的《楚天周末》担任文化记者。

同事评价，他能写一手好影评，是报社公认的才子。对电影的热爱似乎一直伴随着张勤耘，他的诸多头衔中，至今还有一个“湖北省电影家协会副主席”。

父亲张国金回忆，张勤耘喜欢电影，跑文化口。一次，他去北京采访八一电影厂厂长王晓棠。因为从来没见过面，他想了各种各样的办法，一连坚持了好多天，最后“堵”到了王晓棠。

王晓棠接受采访后，发现这个小伙子对电影有研究，很欣赏他，还主动提出“你在北京采访，如果要用车，我给你派车”。

张国金也是在那时候发现儿子沟通能力很强。因为非常热爱电影，张勤耘开始频频

与一些影视明星接触，还曾经专访过张国荣等明星。

张勤耘与杨卫平发生交集是在 1996 年。这一年，时任湖北日报社副社长的杨卫平向报社党委提出，要创办一份市民生活类报纸，改变武汉地区乃至湖北省没有市民报纸的状况。

《楚天周末》前员工王书（化名）回忆，杨卫平的提议得到报社认可。当时准备用《楚天周末》刊号。但《楚天周末》的刊号是周报，需要改成日报，要去北京跑刊号。

张勤耘因为经常去北京，沟通能力强，被杨卫平选中。事后，张勤耘也多次向外人讲述，自己从来没有那么苦过，每天住旅馆，吃盒饭。

1996 年 11 月 12 日，《楚天都市报》创刊。为争取来刊号作出重要贡献的张勤耘深受杨卫平赏识。几个月后，27 岁的张勤耘成为楚天都市报广告部主任。

成立之初，面对《长江日报》和《武汉晚报》的竞争，杨卫平带着手下的那帮记者坐公共汽车，逛市场、菜场、商场，从城市的各个角落“掐”出鲜活的新闻来。

楚天都市报的创办，赶上了全国都市报迅猛发展的大潮。每天早晨，这些带着墨香的报纸送上街头都被抢购一空。创刊当年，楚天都市报的日发行量就达 18 万份。到 2000 年，发行量突破百万大关。

随着发行量的不断攀升，该报成为武汉地区暨湖北全省发行量最大的日报，阅读率遥遥领先。

经济效益也很可观。公开资料显示，《楚天都市报》以 170 万元起家，1998 年上交《湖北日报》1600 万元，1999 年上交 4000 多万元，2000 年截至 9 月就完成了 4000 多万元。

子报养活母报的格局逐渐形成，《湖北日报》也跟着赚了个盆满钵溢。

时至今日，也有内部人士评价：“没有《楚天都市报》，就没有湖北日报传媒集团的今天。”在同事们眼里，张勤耘是“带着成绩说话的人”。

报界“风云人物”

张勤耘的父亲张国金评价，杨卫平是儿子的领路人。

2000 年 8 月 14 日，杨卫平因病去世。杨去世后，年仅 30 岁的张勤耘因为掌管楚天都市报的广告经营，成为实权人物。

2004 年 8 月，张勤耘任湖北日报报业集团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兼楚天广告总公司总

经理。

在王书眼中，这位说话带着广水口音的老同事变得愈加老练。他脑瓜特别活络，口才很好，喝酒的时候，祝酒、敬酒、串场，特别会活跃气氛。

常年分管经营的他，业务能力有目共睹。他曾带领《楚天都市报》广告经营团队实现年广告收入从零到6亿多元，累计创收超过30亿元的飞跃，创造了湖北报业的奇迹，被《中国报业》杂志评为2004年度全国报业十件大事。

从总经理的经营岗位到总编辑的采编领导岗位，张勤耘花了3年。

2007年6月，张勤耘成为湖北日报传媒集团党委委员、副总编辑，兼《楚天都市报》总编辑。

一位《楚天都市报》前员工回忆，张勤耘身为老总，几乎喊得出每个记者的名字。这让同事们对他颇有好感。“我们那时候的福利待遇也很好”。

上述人士介绍，张勤耘对报纸很有感情，时常带人去大街上卖报纸。

担任总编辑后，他就提出楚天都市报的第二个十年战略——向主流化转型。

他曾公开表示，都市报的第一个十年，是开启了服务湖北居民的时代。

而第二个十年，就是在“人人都是麦克风”的网络时代，如何把传统媒体的办报理念，深入网络时代。

张勤耘积极推进报纸改版，2008年组织记者参加汶川地震、北京奥运等报道。他们又推出“信义兄弟”、荆州“10·24”大学生英雄群体、“暴走妈妈”陈玉蓉等报道，连续4年有7件作品获得中国新闻奖。

当时，张勤耘得知“信义兄弟”的感人故事后，迅速安排记者，给足够的版面率先报道了这段兄终弟及的守诺事迹。

这位报社的年轻老总，身上也不断聚集了各种光环：中宣部“四个一批”人才、全国新闻出版行业领军人物、全国青联委员、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等。

2011年11月，张勤耘担任湖北日报传媒集团总经理，正厅级干部。

身兼集团“党委委员”和“总经理”，他在这栋大厦中有着显赫的地位。经过多年组建的商业帝国，旗下除了报纸和杂志，还涉足广告、文化创意产业、酒店投资、小额贷款、房地产开发等16个行业。

“周围都是满水的坑”

长期生活在政商环境中的张勤耘，不可避免地受到大环境影响。张勤耘的变化是在成为集团领导后。王书跟张勤耘同桌吃饭，突然感觉他变化很大。“他变得官味很浓，喜欢打官腔，说官话，不苟言笑，架子大，感觉自己是有身份地位的人。早就看不到他当年的意气风发。”

随着广告总量饱和，纸媒发展进入瓶颈期，广告增幅一直在缓慢下降。

湖北日报一位负责人曾撰文指出，“楚天赚的钱是越来越多，楚天拥有的权利却越来越小。对《湖北日报》来说，楚天这棵摇钱树，自然要牢牢地拽在手里。”

该负责人还称，报纸上药品等虚假广告泛滥，对报纸可信度和公信力造成破坏。“记者编辑呕心沥血打造出来的报纸品牌和影响力，就被整版整版的虚假广告毁掉。”

这些被认为是“楚天之疾”，10多年快速发展，基本借助1996年报纸创设时的红利。

尽管如此，张勤耘作为“新星”被很多人看好。

任总经理后，张勤耘也曾考虑到转型。集团下属的楚天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和湖北楚天传媒珍珠液酒业有限公司都是在2013年成立或者收购的。

在一些项目上，张勤耘也与湖北日报传媒集团的主要领导存在分歧。

年前，张勤耘的父亲就曾听儿子埋怨“工作很难，举步维艰”。家人说，张也曾想过离开《湖北日报》。曾有去出版集团的机会，张勤耘更倾向于去地方，希望能兼任某县级市“一把手”。但最后都没成功。

张国金曾提醒过儿子，常在河边走，难免不湿鞋。儿子的回答让他恐慌，儿子说，周围都是满水的坑，也不知深浅，处处是陷阱。（来源：中国青年报）